

中国近代小说思想

王旭川 马国辉 著

中国近代 小说思想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出版社

I207.4
W4120

中国近代小说思想

王旭川 马国辉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夏 玮
责任校对 郭绍玲
封面设计 高 山

中国近代小说思想

王旭川 马国辉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字数 14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2,000 本

ISBN 7-5617-1661-3/I·154

定价 10.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对象的时代划分	(1)
二、研究的价值	(2)
三、研究的方法与原则	(5)
四、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构架	(6)
第一章 影响与交流	(9)
一、文化交流与小说思想	(9)
二、思想启蒙与小说思想	(13)
三、传播媒介与小说思想	(17)
四、读者、创作与小说思想	(21)
五、小结	(24)
第二章 小说思想的运动与嬗变	(25)
一、思想的萌芽	(25)
二、人性论的小说观	(28)
三、小说界革命	(33)
四、“新小说”与其它小说观	(41)
五、对“新小说”理论的批评	(49)
六、悲观主义的小说观	(55)
七、理论的嬗变	(61)

八、理论的总结与终结	(63)
九、小结	(75)
第三章 形态与结构	(77)
一、体系、概念、范畴	(77)
二、批评形式与思维方式	(81)
三、小说话	(83)
四、批评的精神	(86)
第四章 小说本体论	(91)
一、历史的回顾	(91)
二、小说本体论的形成	(92)
三、小说分类及其原则	(100)
四、史学传统精神的影响	(108)
第五章 小说艺术论	(119)
一、“事”与情节论	(119)
二、形象、性格、典型	(125)
三、叙事方式	(133)
四、描写的艺术	(144)
第六章 小说创作主体论	(147)
一、小说家与社会	(147)
二、小说家的主体特征	(149)
第七章 批评与批评主体论	(160)
一、批评的作用	(160)
二、批评的标准	(168)
三、批评家与批评	(172)
结 语 近代小说思想的历史地位	(175)
附 录 参考书目	(178)
后 记	(180)

绪 论

一、研究对象的时代划分

研究近代小说理论批评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一研究对象的时限。依照一般的史学上的划分,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为标志。中国近代小说思想的研究是否也以此为界进行划分呢?这是我们在进行研究时需要界定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近代史这一概念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社会结构及其思想文化结构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而逐渐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逐步发展,中国逐渐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因此而发生的中西文化思想的碰撞、对抗、渗透、交融乃是近代文化思想发展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与生产方式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非同步的。意识形态或是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新时代的预言者,或是随生产方式的变迁,社会形态的嬗变而产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具有近代意义的小说理论批评并未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出现。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我国的小说理论批评没有受到中西文化冲撞与交流的任何影响,以李卓吾、金圣叹等为代表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已逐渐沉寂,小说理论批评领域一片死气沉沉。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末,面对着日益深重的危机,一批进步的思想家提出主动向西方文化思想学习,进行思想启蒙之时,小说的理论批评开始兴盛。这种小说理论批评已不同于我国古代的传统,不

是古代小说理论的直接延续,而是以不同于以往的形态出现于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中。这当是中国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开端。

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批评时期,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终结点又在哪里呢?现、当代的文学研究者大都认为近代文学是有下限的。基本上都以陈独秀、胡适等开始提倡“文学革命”作为近代文学的终结和现代文学开始的标志。考察中国小说发展史和小说理论批评史,近代小说理论批评至“文学革命”时期,出现了重要的变革,这是近代小说理论批评发展终结的标志。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与现代小说理论批评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差别也是明显的。可以说前者是后者发展的准备,后者是对前者批判的继承。瞿秋白称近代的小説思想与小说创作是失败了了的“第一次的文学革命”^①,为第二次文学革命准备了批判和借鉴的对象。许怀中等认为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是向现代小说理论批评过渡的“孕育与胎动”^②阶段。我们赞同这些观点,认为应以“文学革命”的提出作为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下限。

二、研究的价值

确定了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时限之后,接着要解决的问题是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价值。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似乎处于这样的不幸境地:与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相比,它不能在明清小说理论批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沿着传统的理论批评的道路发展下去;与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相比,它又缺少现代美学意识与理论系统。近代小说理论批评常常以贫乏的特点呈现于人们面前,我们似乎从中发掘不到什么太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古代和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研究者对此都是“点到为止”,近代小说理论研究相对冷清的情

^①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摘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② 许怀中《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变迁》2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况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传统意义上的估价是否完全正确尚待商榷。因为事实上,不仅在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中含有相当精采的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而且,从小说理论批评演化发展的角度审视,它还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在此,我们选择三则古人、近人对小说认识的记载,从中颇可见其意味: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第十)

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谰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类》)

臣谨按稗官野史繇来旧已,自汉班固立小说家于《艺文志》,厥后作者日以繁盛。泰西文学家亦多以小说鸣,且谓其移风易俗,收效之捷,足抵演说。若即以小说为演说,尤足启发流俗之观念。(《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四)

从东汉初年至清乾隆年间,跨时一千八百余年,小说早已从萌芽状态而趋于成熟。但正统的封建的小说观变化甚少。纪昀甚至在《四

库全书存目》中都拒绝著录、接收几乎所有的白话小说和一部分文言小说,斥之为“猥鄙荒诞,徒乱耳目”^①。而时隔一个世纪,辛亥革命后不久,一部分清王室人员和前清遗老所编纂之《皇清文献通考》,对小说的评价已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个较为典型的事例表明了人们正在从封建正统观念中走出,意味着现代小说观念取代了古代的传统观念,小说的文学地位已被普遍承认。而这一切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它为小说观念从古代向现代发展廓清了道路,使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位置移到了中心。

当代研究者在评价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批评在文学史、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时,或视为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更新时期”^②,或视之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③, (这当然也包括视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为二十世纪小说思想之起点)等等,显然,研究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近代小说理论批评处于一个独特的历史发展位置上,是古代过渡到现代的纽带和桥梁。可以说这一类词汇用于概述这一时期是比较形象而恰当的。这一些正是近代小说思想研究的价值之所在。苏珊·朗格说:“当我们自己生活的文化突然冲破了自己的边界而与其它文化相接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自己新发现的情感模式发生兴趣。”^④近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学思想正处于这样的一个中西冲突交融的历史时刻,近代学者已对此有了敏锐而深刻的认识,王国维曾这样说:“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西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⑤指出西方文化思想进入中国,使中国文化思想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重大意义。近代小说思想处于两种文化思想接触的交汇点上,这种交汇的震荡显著地表现于理论批评之中。近代又是中

①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类》。

② 陈漱豫著《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161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

③ 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④ 《艺术问题》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⑤ 《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

国社会形态进入巨变的时代,它又对小说理论批评及其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小说理论批评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点。这个“处于古今中外大汇聚大变革的交错点上,各种新旧事物极为错综复杂地折射在人们的思想中,新旧思想和事物差距和变化如此之大”^①的时代中的小说理论批评,其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当我们又一次打开国门,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审视近代的小説理论批评,将是很有益处的。

三、研究的方法与原则

华莱士·马丁说:“各种文学理论是为了不同目的被创造的,因此当比较它们的时候,必须既要考虑它们的准确性,也要考虑它们的有用性。”^②他的话是针对当代众多的文学理论的研究而发的,指出了每种文学理论都有其有用性、侧重点。这段话对我们进行文学批评史研究也不无启发。任何的文学理论批评都因时代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倾向、目的,都为了解决这一个时代所出现的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而显示出一个时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色。当我们研究文学理论思想史时,我们不仅需要以全新的文学理论为基点,对批评史进行发掘、分析、评价,开掘一个新的角度,向人们展示文学批评史的新的意蕴、内涵,也不仅在这种分析、评价中实现不同的文学理论批评之间的交流、互渗,从而更加充实现有的理论批评,丰富现有的文学思想,而且还要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历史”性。换言之,我们不仅要揭示某一个文学批评时代有什么理论的成就,有什么理论的缺憾,增加了什么新的课题,忽视了什么东西,更要去揭示形成这一时期理论特征的各种因素。立足点更侧重于过去,更侧重于历史性的价值。由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特殊价值,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便在于后者。

①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47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当代叙事学》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着眼于此,于是我们不能不改变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常用的以史为经、以批评家为纬的研究构架,不以对近代小说批评家及其思想观点进行一一罗列、评价的方式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式,我们以为,这种近乎博物馆式的观点陈列不仅难免会夹杂许多“古已有之”的假古董,而且使人难以从整体上去认识、把握近代小说思想的形态特征。当然,这种方式自有独特之处,它可以充分表现近代文学思想的易变、流动、多面性的特点。但是,理论批评的“热点”、倾向性、运动性诸特征,由于以批评家为重点进行研究,就较难有透彻的研讨。我们当然也不能以形态的研究作为全部的目的,这种方式往往会使研究流于表面现象的揭示,流于抽象性,而不能充分表现展示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生动性,对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中一些新的问题也会有所忽视。因为只有经过具体的研究,方能在此基础上对一个研究对象进行高度抽象的把握。本着这种思路(或原则),我们确定了本书对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其理论的历史价值。围绕这一目的,我们以理论批评的专题为纬,通过对具体的理论批评“热点”、倾向以及新的理论问题的出现与变化等的研究,来探讨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形态与特征;以形态研究为经,通过对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内在结构、运动、外部关系诸方面的研究,来确定近代小说理论批评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和独特的历史价值。而这两方面的研究又是互相依靠、互相渗透与补充的。

四、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构架

本书的研究重点与原则确立了本书研究的基本构架。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研究。我们从三个方面对近代小说理论批评进行考察。从关系方面,通过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与外部的互相联系、影响,去研究外部环境对近代小说理论批

评的制约作用,去考察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运动特点与历史文化的规约性;从外延方面,通过对近代小说思想运动的横向的链式展开,在动态中考察小说理论批评的特征;从内涵方面,通过对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静态分析,从纵向轴的角度去把握近代小说思想的理论特征。这里包含着两对辩证统一的矛盾:从理论批评内部,模态结构层次的研究与流动的历史的研究之对立与统一,这也是共时态的研究与历时态的研究交互运用。从理论批评与外部关系,看内外因素的互相影响与纠缠对小说理论批评形态形成与发展的作用。

第二部分是微观研究,我们首先将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种种专题、观点纳入一个理论的框架,(这当然并不是说近代小说理论批评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框架为据点将近代小说理论批评分门别类一番,然后进行混杂式的填充。建立一定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同时可以让我们较为清楚地看到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重点与贡献在什么方面。)这个框架并不是完美得近乎是现代理论系统的再现,而是依据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理论重点、专题而设立的,因此,许多重要的、在古代或当代颇受重视的理论问题可能忽略了。我们以为,我们应当尊重文学理论史,既不能拔高,也不能贬低它。应当对之有如实的历史的评价。

其次是对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中所提出的、论述的一些理论问题与观点的研究。对以批评家为中心的研究形式的打破,固然能使我们从新的视角、模式去审视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从而可能使我们对理论批评的历史性价值有新的认识,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问题。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中对某个理论问题的认识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理论观点往往以错综的、甚至矛盾的、流动的形态呈现于我们面前,使我们难以对之进行逐一的评价。而且,依据现代的理论观点对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一些观点进行盖棺定论式的宣判与评价,本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它较少顾及到形成这种理论观点的诸

种主、客观因素。因此,我们评价的立足点必须有所转移,评价的方式必须有所改变:立足于近代,以古代和现、当代文学思想为参照系,以探究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中一个个理论观点的历史演化过程,揭示其独特的价值;重视形成理论观点的诸因素之探讨,在考察各种批评观点的倾向、分歧的同时,分析形成诸种理论观点及错综关系的内、外在各种关系及因素。换言之,将小说理论观点置于纵(历史流程)和横(现实因素)的交叉点上,以期对其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第一章 影响与交流

近代小说思想的一个显著现象是外部环境对小说思想的发生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与重要的影响。这种联系与影响的程度是过去小说批评史、甚至文学批评史的任何时代所不具有的。这些外部环境以其明显的或隐蔽的方式影响于小说思想，它和小说思想内部的矛盾因素一起，共同制约着近代小说思想的形态特征、运动与变化。因此近代小说思想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是近代小说思想研究所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一、文化交流与小说思想

近代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是近代小说思想得以兴盛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曾写道：“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中国古老的、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思想的逐渐解体是与西方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思想的进入与加强、扩展同步进行的。西方文化思想在

^①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页。

中国的地位,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在于“船坚炮利”,在于工业技术上超过中国而已,“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①因而信奉洋务运动的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国之衰弱,乃在于船不坚炮不利,在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上应向西方学习。而在社会文化思想与政治结构方面,则中国作为几千年的文明之邦,绝对优于西方文明。虽然当时有一些人注意到西方文化的某些优势,而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向西方学习。如洋务派人物郭嵩焘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得国千年可也。”^②但就是这样的主张在当时也不被人们所理解。如中国两家最大的翻译机构:同文馆与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不过千百中之十一,大抵算化工艺诸学居多,而政治之书最少”。^③

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经过义和团事变,“本国的弱点完全显出,外人底势力更多一番认识,而鉴于日本以数十年的维新工夫,竟能称霸东亚,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于是更知西政之能强国而努力模仿。……严复所译之《天演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论》等书散布于国中,更使国人知西洋物质文明之外尚有精神文明,而且所谓精神文明,并不亚于老大的中国;于是国人始知西洋所有者不只是工艺的末技,并有支配工艺的社会伦理。反观我国,无一可及,便鄙弃国内一切文物而思全盘承受西洋化”^④。对西方文明的重新认识与估价,导致了向西方文化思想学习的热潮,形成了所谓的“学问饥荒”。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大量地学习、介绍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思想。这种思潮也促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如梁启超说:“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日本每一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

①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一。

② 郭嵩焘《使西纪程》。

③ 盛宣怀《奏请设立译书院片》,1902年。转引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50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④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194—195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影印。

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①这也促使我国产生留学的热潮，留日学生数年间便达一万余人，这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明向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这样叙述道：

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这些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大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近代我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窗口便是日本。日本原来是一个弱小的国家，1868年开始进行明治维新，国力迅速增加，26年后，竟歼灭清朝的北洋水师，夺取朝鲜，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切，使人们在痛恨日本的同时，认识到日本的迅速强大是它学习西方文明，进行变法的结果。因此，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隐隐将日本作为成功地向西方学习的楷模，希望了解日本崛起的原因。康有为为黄遵宪作《〈日本杂事诗〉序》，指出：“方今日本新强，争我于东方，考东国之故者，其势至急。”并多次上奏折主张大量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大量翻译日本书籍，“以为日本变法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②并自编《日本书目志》，介绍日本书籍。梁启超也说：“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

①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卷三十五。

②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250页，中华书局1981年。

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① 希望从日本吸取成功的经验。

如果将西方文化思想的涌入和进步知识分子对其的渴望这一时代背景联系起来，我们不难看到近代小说思想出现于维新运动时期，在二十世纪初大为繁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冲破传统的、窒息了明清的进步小说批评思想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在世纪之交所出现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潮流为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现实性。人们看到西方是不歧视小说的，大文豪都写小说，甚至政治家、思想家也写一些小说。大小说家与大政治家、大思想家有着相等的地位。而在我国呢？传统观念视小说为“邪宗”，不仅不能列于文学之林，而且只能作为“坏人心术”的“海盗海淫”之物来对待。小说家也当然毫无地位可言。一些伟大小说家如施耐庵、罗贯中等据说死后还要受折磨，子孙也要受牵连，“三代皆哑”，且被认为这是“天道之报”^②等等。吴敬梓作《儒林外史》，无一丝“海淫海盗”之嫌，但其挚友程晋芳在悼念他的诗中不无遗憾地说：“余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③ 在这样一个视官位为最尊贵、等级森严的封建国度中，欲将小说家视为尊贵者，不免是骇世惊俗之论。狄楚卿说：“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骇焉。吾昔见日本诸学校之文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者，吾益骇焉。继而思之，何骇之与有？”^④ 如果没有接受西方的文化思想，人们在惊骇之后大概会把它当作笑料来讲吧。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是西方的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念奠定了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思想基础；是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促成了近代小说理论批评

①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二。

②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3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③ 程晋芳《勉行堂集》卷二，《春帆集》。

④ 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七号1903年。